

# 家庭孝道传统对农村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链式中介模型 ——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分析视角

余益兵<sup>1,2</sup>, 贡 翀<sup>1</sup>, 于家伟<sup>1</sup>

(1.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广西 桂林 541006;

2. 广西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理高校重点实验室,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 采用个体中心和变量中心两种分析取向, 对全国4个省份691名农村青少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考察家庭层面上的孝道规范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及领悟家庭支持、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 权威性孝道、互惠性孝道与积极情绪适应各项指标均显著正相关; 互惠性孝道通过领悟家庭支持和自我分化的链式中介作用、权威性孝道通过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影响积极情绪适应, 且上述模型具有性别等同性; 以双高型家庭孝道类型(15.05%)为参照, 互惠主导型(48.59%)、双低型(23.35%)和权威主导型(13.01%)三种类型均会通过降低家庭支持或自我分化而负向预测积极情绪适应。结论: 互惠性和权威性家庭孝道规范对农村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均具有积极影响且内在作用机制各有不同。

**[关键词]** 家庭孝道传统; 积极情绪适应; 领悟家庭支持; 自我分化; 农村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G 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2023)06-0035-15

## 一、引言

“孝”是中国家庭文化的核心<sup>[1]</sup>。作为儒家伦理道德传统之首, 孝道不仅仅是指服从和尊敬父母, 也是由文化界定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样本与准则<sup>[2]</sup>, 它影响了儒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sup>[3]</sup>。然而, 面对我国近百年来家庭伦理、家庭情感和家庭价值等方面所受到的严重冲击<sup>[4]</sup>, 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全球化、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及家庭规模缩小的背景下, 学术界对于孝道是否过时或已经衰落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针对农村地区老无所养的现象提出了孝道衰落的警示<sup>[5-6]</sup>, 分析了青少年孝道缺失的表现、特征和成因<sup>[7]</sup>。另一些学者则主张传统孝道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或可转变为一种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孝道<sup>[8]</sup>。从我国孝道文化10年间的演化来看, 孝道在现阶段不仅未曾“衰落”, 代际双方反而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合作模式<sup>[9]</sup>。以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也发现, 青少年

子代与亲代在对待传统孝道上既出现了代际差异<sup>[1]</sup>, 又存在稳定的代际传递效应<sup>[10]</sup>。本研究认为, 孝道作为一种亲子关系的家庭规范, 本身就具有文化传承性和时代适应性的双重特征。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 孝道作为一种家庭伦理制度对子代的影响是通过家庭整体层面上的孝道家风传承实现的。以往研究侧重从成年子女对老年人孝行(如赡养)的历史变迁、亲代与子代对于孝道的价值认同差异等角度考察孝道的文化传承, 未能从家庭整体层面考察个体孝道得以传承的家庭伦理环境。家庭孝道传统(family traditions of filial piety)是家族成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日用而不觉的共享行为规范, 它构成了一个家庭有别于其它家庭的独特的孝道环境。为此, 余益兵<sup>[11]</sup>依据双元孝道模型编制了家庭孝道传统问卷, 分为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两个维度。根据Magnusson和Stattin<sup>[12]</sup>的整体交互论观点(holistic interactionist viewpoint), 个人的发展和持续运作是由个人与环

**[收稿日期]** 2023-05-3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农村寄宿制留守儿童主观社会地位的构成要素、获得机制与影响作用”(20YJA880077);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立项课题“孝何以为德之本? 广西世居民族青少年孝道信念对其道德动机的影响机制研究”(XYCSR2023008)

**[作者简介]** 余益兵(1974—), 男, 安徽池州人,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与儿童发展。

境互相作用与配合的结果。因此,个人的孝道信念和孝行发展与整个家庭的孝道传统密切相关。尽管杨国枢和叶光辉<sup>[13]</sup>在论述孝道形成历程时强调了“孝行环境”的重要性,但从整体家庭层面探究孝道影响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

从时代适应性角度看,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可以为检验孝道式微衰落或是时代转型提供分析框架。费孝通<sup>[14]</sup>认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制度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绵延继替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完整性源于父母子三角关系的完整性,而孝道则是维护家庭秩序稳定而提出的基本家庭伦理规范。叶光辉<sup>[15]</sup>对不同时代的孝道进行分析后发现,孝道内涵会随着社会环境的主流趋势变化而变化,但其整体始终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共存。在现代社会,孝道在维系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sup>[16]</sup>。尽管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孝道认知和行为维度,而孝道环境同样在其中起重要作用<sup>[17]</sup>。因此,从家庭孝道传统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澄清传统孝道的现实价值,从而拓展中国传统孝道心理的研究视角。

基于对儒家传统文化和孝道研究文献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家庭孝道传统对青少年依然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明宗义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都说明了孝道与个体发展之间存在关联。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和逐渐稳定的阶段<sup>[18]</sup>,需要解决亲密与自主的关键任务,否则将面临诸多适应问题<sup>[19]</sup>。已往研究已揭示了孝道信念对个体的心理适应<sup>[20]</sup>、人际适应<sup>[21]</sup>、学业适应<sup>[22]</sup>、行为适应<sup>[23]</sup>等方面的积极影响,而作为衡量个体适应环境能力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标之一<sup>[24]</sup>的情绪适应则较少受到关注。更值得关注的是,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造成了生活在其中的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差异。正如《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农村户口人群中抑郁高风险的检出率略高于城镇户口人群。特别是部分农村青少年家庭(如留守儿童家庭)面临着家庭结构性缺失的风险,不同于费孝通<sup>[25]</sup>所提出的“双系抚养”,而这会对青少年造成多方面的不良影响<sup>[26]</sup>。虽然Ho<sup>[2]</sup>发现在低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中孝道态度更为明显,但这是否能更好地促进农村青少年的适应

水平,也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综上,本研究从家庭环境与个体发展的视角考察家庭孝道传统对农村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家风、促进农村青少年积极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 二、文献评述

### (一) 家庭孝道传统与积极情绪适应的关系

家庭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直接环境,是个体社会化的最初场所。Yeh<sup>[27]</sup>提出了目前学者比较认可的双元孝道模型(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简称DFPM)。该模型从亲子关系的视角将传统孝道划分为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两个维度,可以作为分析家庭孝道传统与个体适应功能的理论框架。

多数研究揭示了互惠性孝道对个体具有积极的适应功能。在双元孝道模型中,互惠性孝道反映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报恩敬爱之意,要求子女“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纪孝行》)。它强调的是子女为父母提供情绪、物质和经济的支持以报答养育之恩,符合儒家伦理中的“亲亲”原则(favoring the intimate)。由此,延伸为在社会互动中以感恩之心待人,所谓“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天子章》)。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互惠性孝道信念显著预测感知的母亲支持增加和亲子冲突的减少<sup>[28]</sup>。究其原因,作为描述亲子关系的不同侧面,互惠性孝道与亲子依恋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的重叠<sup>[29]</sup>。根据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理论(Internal Working Model Theory),个体与主要照料人之间形成的依恋关系模式会影响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感知、评价和行为反应<sup>[30]</sup>,而以信任、亲密和彼此依赖为特征的安全型依恋关系则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心理适应水平。实证研究也表明,互惠性孝道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和自尊<sup>[31-33]</sup>。

然而,关于权威性孝道与个体心理社会功能的关系,目前的研究结论还不一致。本研究认为,权威性孝道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个体适应功能的影响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路径发挥作用。一方面,权威性孝道强调子女先满足父母的愿望、遵从父母的意志、维护父母的脸面以及完成家族香火延续的责任等,它体现了对规则和义务的遵从,符合儒家伦

理中的“尊尊”原则(respecting the superior)。这一原则要求子女敬畏亲子关系中的权力距离并遵从高位者的要求、愿望和声誉,抑制个体自主性的发挥和情感表达。另一方面,权威性孝道通过建立家庭伦理规则也有助于子女获得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sup>[29]</sup>。青少年只有遵循既有的家庭伦理规范和角色期待才能获得积极评价进而促进自我价值的形成<sup>[34]</sup>。Sun等人<sup>[35]</sup>的研究发现,权威性孝道既通过降低个人自主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又通过增强关系自主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可见,权威性孝道具有两面性。综上提出研究假设H1:家庭孝道传统会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产生影响。

## (二) 领悟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环境(家庭孝道规范)对青少年个体发展(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可能需要个体对环境的感知来中介。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作为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sup>[36]</sup>,会对青少年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sup>[37]</sup>。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来自外界或者重要他人等提供的工具性或者情感性支持的主观感知,被视为个体的心理资源和应对机制<sup>[38]</sup>。有研究表明,只要感知到有人关心支持就足以帮助个体应付困境<sup>[39]</sup>,因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解释为积极而非消极的<sup>[40]</sup>。截止目前,尚未有研究考察社会支持在家庭孝道传统与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中介机制。已有研究表明,孝道信念水平高的青少年不仅与父母保持亲密的关系,还能容忍亲子关系中的权力等级差异,努力维持与父母之间的和谐关系以感谢父母的养育<sup>[41]</sup>。即使面对父母的严格控制,他们也会将之理解为父母为自己好而正向预测其感知的母亲支持水平<sup>[28]</sup>。领悟家庭支持作为一种保护因素,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适应水平,如自尊<sup>[42]</sup>、生活满意度<sup>[43]</sup>和积极情感<sup>[44]</sup>。基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H2:领悟家庭支持在家庭孝道传统和积极情绪适应中发挥中介作用。

## (三) 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

作为家庭伦理环境,孝道影响个体适应功能的另一个途径可能是通过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实现的。一方面,自我分化使个体在与重要他人的互动关系中保持自主的能力<sup>[45]</sup>。个体良好的心理适应状态是“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和“亲密性(togetherness)”这两种力量相互作

用、保持平衡的结果。前者使个体在心理上与他人区分开来,后者使得个体在心理上与他人保持联结和融合。根据二元孝道模型,权威性孝道强调在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单向遵从并延伸为社会等级制度中“控制—服从”规范,这一规则不仅抑制了个体的自主性,也阻碍人际间的平等和亲密关系,而互惠性孝道则有助于增强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结。已有研究也表明,权威性孝道负向预测个体自主、能力、人际等基本心理需求满足,而互惠性孝道则对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有正向预测作用<sup>[46]</sup>。尽管以往研究侧重在个体层面上探讨孝道的适应功能,但孝道作为亲子关系的一种体现,也可体现在整体的家庭功能方面,从而对个体的自我分化产生影响<sup>[47]</sup>。另一方面,自我分化对于个体良好适应具有重要意义。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自尊<sup>[48]</sup>、生活满意度<sup>[49]</sup>和人际适应能力<sup>[50]</sup>,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出理智的决定<sup>[51]</sup>,而自我分化水平低的个体则面临更多的压力<sup>[52]</sup>、焦虑<sup>[53]</sup>等适应不良问题。由此,提出研究假设H3:自我分化在家庭孝道传统和积极情绪适应中发挥中介作用。

另外,领悟家庭支持可能也会影响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Bowen<sup>[54]</sup>的家庭系统理论提出,自我分化反映了家庭教养模式与个体发展轨迹的关系,个体自我分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的家庭内部运作和情绪情感联结过程。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功能有利于个体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化,而感知到不公平的家庭环境可能导致个体自我分化不足<sup>[47,55]</sup>。同时,家庭支持会对个体的自我分化有正向预测作用<sup>[56]</sup>。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4:领悟家庭支持和自我分化可能在家庭孝道传统和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最后,关于孝道的已有研究多采用变量中心的分析思路,而根据Howard和Hoffman<sup>[57]</sup>的观点,变量中心的分析方法旨在探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忽略了群体的异质性,个体中心的研究侧重探究不同亚群体与变量组合的关系,可以更加细致地描绘亚群体的特征。在孝道领域,个体中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不同孝道维度组合如何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以往研究也表明,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根据二者的维度得分可划分为四种类型<sup>[15,27,41]</sup>:双高型(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得分均高于平均水平)、互惠主导型(互惠性孝道得分高于平均水平,权威性孝道低于平均水



平)、权威主导型(互惠性孝道得分低于平均水平,权威性孝道高于平均水平)和双低型(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得分均低于平均水平)。通过分别探讨四种家庭孝道传统类型与个体适应发展之间不同的联系,互惠性孝道、权威性孝道与个体适应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被更清晰地揭示出来。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多数局限于孝道的个体认知和行为层面,而忽略了家庭孝道环境的重要性。且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孝道与积极情绪适应的个别维度,还不能很好地揭示其中的关键心理机制。因此,本研究试图以双元孝道模型为分析框架,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两种分析方法,探讨青少年家庭孝道传统对其积极情绪适应的预测作用以及领悟家庭支持和自我分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广西、福建、安徽、江苏4个省份的4所农村中学随机抽取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3个年级的被试进行问卷测试,共发放问卷700份,剔除胡乱作答、极端值和题目缺失较多的无效问卷9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691份,问卷有效率为98.71%。被试年龄在 $13.19 \pm 1.01$ 岁。男生325人(47%),女生362人(52.4%),性别编码缺失4人;7年级336人(48.6%),8年级128人(18.5%),9年级224人(32.4%),年级编码缺失3人。

#### (二) 研究工具

1. 积极情绪适应。积极情绪适应由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自尊三个评估指标组成<sup>[58-59]</sup>。(1) 积极情感。采用Bradburn编制、陈文锋和张建新<sup>[60]</sup>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本研究采用其中的积极情感分量表,共8题,用于评定个体在1周内实际感受到的积极情感状态。量表采用4点计分(1表示“从不”,4表示“经常”),得分越高说明情感体验越积极。在本研究中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6。(2) 生活满意度。采用Diener等人<sup>[61]</sup>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5题,用来评价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量表采用7点计分(1表示“满意”,7表示“最满意”),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越满意。在本研究中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1。(3) 自尊。采用汪向东等人<sup>[62]</sup>修订的自尊量表,共10

题,用于评定青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量表采用4点计分(1表示“从不”,4表示“经常”),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5。

在本研究中,考虑到积极情绪适应是由3个观测量表(共23题)的潜变量计算而来,为了降低参数估计偏倚,根据吴艳和温忠麟<sup>[63]</sup>关于结构方程建模中题目打包策略,采用独立打包法把同一因子下的题目打包,将每个维度打包成两个或三个观测指标进行三因素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项拟合参数均处于可接受范围: $\chi^2/df = 2.27$ , RMSEA = 0.043, SRMR = 0.023, CFI = 0.98, TLI = 0.97。

2. 家庭孝道传统。采用余益兵<sup>[11]</sup>编制的家庭孝道传统量表,侧重从子女报告的角度考察家庭对孝道传统重视程度,包括2个维度:权威性孝道(为了父母的心愿,子女要暂时放弃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和互惠性孝道(父母不开心时,子女要与父母交谈,理解、宽慰他们)。共10题,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两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为 $\chi^2/df = 3.93$ , RMSEA = 0.07, SRMR = 0.05, CFI = 0.95, TLI = 0.93。其中,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呈显著正相关( $r = 0.12$ ,  $p = 0.002$ )。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的Cronbach  $\alpha$ 系数分别为0.72和0.85。

3. 领悟家庭支持。采用Gerg Zimet编制、姜乾金等人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中的领悟家庭支持维度<sup>[62]</sup>,共4题,采用7点计分(1代表“极不同意”,7代表“极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支持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1。

4. 自我分化。采用吴煜辉等人<sup>[64]</sup>修订的自我分化量表,由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断绝、情感融合4个维度组成,共27题。采用6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6表示“完全符合”),除自我位置分量表正向计分外,其余3个分量表全部为反向计分。根据吴煜辉等人修订的计分方式,自我分化总得分为各题目粗分之总和,得分越高,自我分化水平越好。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8。

#### (三)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研究获得了学生家长及教师同意,由专业的心

理学人员在课堂上发放问卷、当场收回并整理归档。采用 SPSS. 26 对数据进行整理、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 Mplus. 8. 3 进行路径分析、链式中介模型的建构和多类别自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为了估计同一数据收集方法可能带来的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素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sup>[65]</sup>，对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公因子解释总变异量为 23. 44%，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同时，采用共同方法变异（CMV）检验，将领悟家庭支持、自我分化、家庭孝道传统、自尊、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作为局部因子，将潜在的共同方法因子作为全局因子进行结构方程建模<sup>[66]</sup>。此外，构建 1 个不含共同方法潜在因子的模型。结果发现，考虑潜在方法因子的模型拟合指数为： $\chi^2 = 371. 30$ ， $df = 119$ ， $RMSEA = 0. 06$ ， $SRMR = 0. 05$ ， $CFI = 0. 93$ ， $TLI = 0. 91$ ，不考虑潜在方法因子的模型拟合指数为： $\chi^2 = 380. 91$ ， $df = 120$ ， $RMSEA = 0. 06$ ， $SRMR = 0. 05$ ，

$CFI = 0. 93$ ， $TLI = 0. 91$ 。比较发现，两个模型不存在显著差异（ $\Delta CFI < 0. 01$ ， $\Delta TLI < 0. 01$ ）<sup>[67]</sup>，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描述统计

以性别（男、女）作为组间变量，以互惠性孝道、权威性孝道、领悟家庭支持、自我分化、自尊、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为结果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互惠性孝道（ $t = 2. 436$ ， $p = 0. 015$ ， $d = 0. 188$ ）、领悟家庭支持（ $t = 3. 804$ ， $p < 0. 001$ ， $d = 0. 293$ ）、自我分化（ $t = 2. 957$ ， $p = 0. 003$ ， $d = 0. 239$ ）、自尊（ $t = 5. 006$ ， $p < 0. 001$ ， $d = 0. 390$ ）、生活满意度（ $t = 4. 572$ ， $p < 0. 001$ ， $d = 0. 356$ ）和积极情感（ $t = 3. 892$ ， $p < 0. 001$ ， $d = 0. 303$ ）的性别差异均显著，权威性孝道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t = 1. 385$ ， $p = 0. 167$ ），即女生在互惠性孝道、领悟家庭支持、自我分化、自尊、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水平显著低于男生。

然后，将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符合理论预期（见表 1）。除权威性孝道和性别、自尊相关不显著之外，其他各变量两两之间均表现为显著相关（ $ps < 0. 05$ ）。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 $n = 691$ ）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							
2 互惠性孝道	-0. 09 *	—						
3 权威性孝道	-0. 06	0. 12 **	—					
4 领悟家庭支持	-0. 15 ***	0. 45 ***	0. 11 **	—				
5 自我分化	-0. 12 **	0. 19 ***	-0. 09 *	0. 40 ***	—			
6 自尊	-0. 19 ***	0. 33 ***	0. 05	0. 52 ***	0. 56 ***	—		
7 生活满意度	-0. 18 ***	0. 42 ***	0. 17 ***	0. 57 ***	0. 50 ***	0. 63 ***	—	
8 积极情感	-0. 15 ***	0. 34 ***	0. 08 *	0. 55 ***	0. 47 ***	0. 67 ***	0. 63 ***	—
<i>M</i>	—	4. 43(4. 32)	2. 41(2. 33)	5. 29(4. 96)	3. 77(3. 60)	2. 98(2. 75)	5. 54(5. 18)	3. 01(2. 81)
<i>SD</i>	—	0. 59(0. 64)	0. 73(0. 66)	1. 11(1. 20)	0. 71(0. 70)	0. 58(0. 58)	0. 98(1. 03)	0. 59(0. 67)

注：括号外为男生的  $M/SD$ ，括号内为女生的  $M/SD$ ；性别为虚拟编码：男 = 0，女 = 1；\*  $p < 0. 05$ ，\*\*  $p < 0. 01$ ，\*\*\*  $p < 0. 001$ ，下同。

（三）家庭孝道传统对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机制分析——变量中心视角的分析

1. 中介效应分析。考虑到性别与各研究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偏倚，这里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sup>[68]</sup>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互惠性

孝道对积极情绪适应的总效应显著（ $\beta = 0. 336$ ， $p < 0. 001$ ），而权威性孝道对积极情绪适应的总效应不显著（ $\beta = 0. 045$ ， $p = 0. 134$ ）。根据温忠麟等<sup>[69]</sup>的观点，当总效应  $c$  不显著即  $X$  与  $Y$  关联不显著，但这一结果与已有理论不相吻合时，可以进

行广义中介效应分析，探讨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现象。同时，也有研究指出总效应显著并不是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必要条件<sup>[70-71]</sup>，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依旧将权威性孝道纳入中介分析模型。

然后，在模型中加入领悟家庭支持和自我分化两个中介变量，得到的路径模型如图 1 所示。采用 Mplus8.3 软件极大似然法考察模型拟合情况，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良好： $\chi^2/df=3.89$ ，RMSEA = 0.07，SRMR = 0.03，CFI = 0.97，TLI = 0.95。在结构方程模型图（见图 1）中我们可以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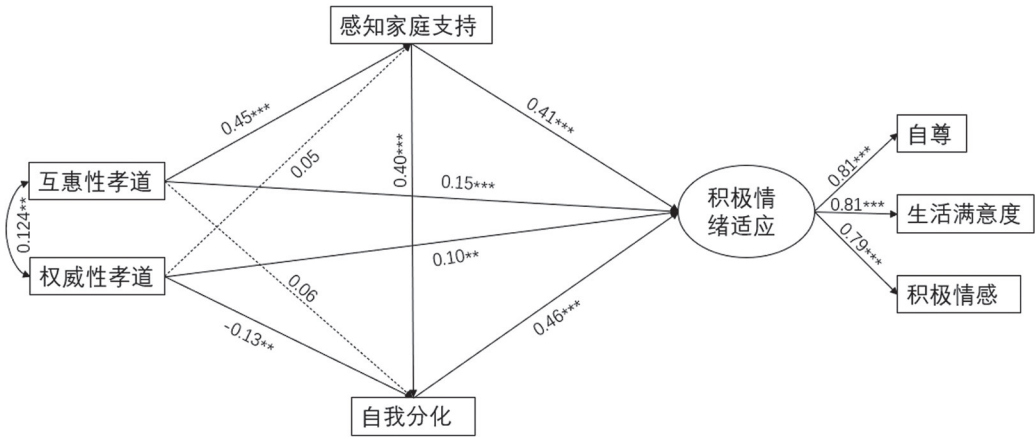


图 1 互惠性孝道、权威性孝道和积极情绪适应的链式中介模型

注：图中路径效应值均为标准化数值；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为了图片的简洁，控制变量性别在图中省略。

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 Bootstrap 检验，重复取样 5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加入了 2 个中介变量后，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仍然能直接地显著预测积极情绪适应，直接效应值分别为 0.112、0.067。领悟家庭支持在互惠性孝道

(1) 互惠性孝道可以显著预测领悟家庭支持 ( $\beta = 0.45, p < 0.001$ ) 和积极情绪适应 ( $\beta = 0.146, p < 0.001$ )；(2) 权威性孝道可以显著预测自我分化 ( $\beta = -0.132, p < 0.01$ ) 和积极情绪适应 ( $\beta = 0.097, p < 0.01$ )；(3) 领悟家庭支持可以显著预测自我分化 ( $\beta = 0.399, p < 0.001$ ) 和积极情绪适应 ( $\beta = 0.406, p < 0.001$ )；(4) 自我分化可以显著预测积极情绪适应 ( $\beta = 0.461, p < 0.001$ )；(5) 其余路径不具有显著预测性。

与积极情绪适应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0.141，占总效应值的 41.7%；自我分化在权威性孝道与积极情绪适应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0.042，占总效应值的 -93.7%；领悟家庭支持—自我分化在互惠性孝道与积极情绪适应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0.064，占总效应值的 18.9%。

表 2 互惠性孝道、权威性孝道和积极情绪适应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

自变量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值	SE	95% CI
互惠性孝道	直接效应	互惠性孝道→积极情绪适应	0.112	0.028	[0.058,0.166]
	间接效应	互惠性孝道→领悟家庭支持→积极情绪适应	0.141	0.018	[0.109,0.179]
		互惠性孝道→领悟家庭支持→自我分化→积极情绪适应	0.064	0.011	[0.046,0.088]
权威性孝道	直接效应	权威性孝道→积极情绪适应	0.067	0.022	[0.024,0.112]
	间接效应	权威性孝道→自我分化→积极情绪适应	-0.042	0.012	[-0.068,-0.019]

综上所述，互惠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对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中存在不同的内部机制，互惠性孝道

可以通过领悟家庭支持与自我分化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积极情绪适应；权威性孝道则通过自我分化的

中介作用影响积极情绪适应。

3. 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检验。本研究检验了领悟家庭支持、自我分化的中介效应是否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性。首先，分别检验男生与女生家庭孝道传统对积极情绪适应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发现，男生模型各项拟合指标为： $\chi^2/df=2.23$ ，RMSEA = 0.06，SRMR = 0.03，CFI = 0.98，TLI = 0.96；女生模型各项拟合指标为： $\chi^2/df=3.24$ ，RMSEA = 0.08，SRMR = 0.03，CFI = 0.97，TLI = 0.94。总体上来说，各项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可进行等组比较。随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多组比较的方法设定等值模型，模型1（基准模型）：定义男生组和女生组具有相同的模型结构，路径系数自由估计；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限定男生组和女生组对应的路径系数相等。结果发现，两个模型拟合结果可以接受（ $\chi^2/df=1.93$ ，RMSEA = 0.06，SRMR = 0.03，CFI = 0.98，TLI = 0.96； $\chi^2/df=1.93$ ，RMSEA = 0.06，SRMR = 0.03，CFI = 0.98，TLI = 0.96），此外，两模型间拟合指数差异 $\Delta CFI$ 与 $\Delta TLI$ 均小于0.01，这表明模型1与模型2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sup>[67]</sup>，即家庭孝道传统和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不存在性别差异。

4. 家庭孝道传统对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机制

分析——个体中心视角的分析。根据叶光辉<sup>[15]</sup>的分类，将家庭孝道传统的两维度的得分作为聚类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将被试划分为双高型（96/15.05%）、互惠主导型（310/48.59%）、权威主导型（83/13.01%）和双低型（149/23.35%）。4种孝道类型在互惠性孝道得分 [ $F(3, 634) = 449.02, p < 0.001$ ] 和权威性孝道得分 [ $F(3, 634) = 452.60, p < 0.001$ ] 两维度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4种类型的划分是有效的。然后，将家庭孝道传统的4个类型作为分类变量，将青少年的自尊、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单因素ANOVA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家庭孝道传统的4个类型在自尊 [ $F(3, 611) = 16.93, p < 0.001$ ]、生活满意度 [ $F(3, 615) = 30.80, p < 0.001$ ]、积极情感 [ $F(3, 612) = 15.21, p < 0.001$ ]、领悟家庭支持 [ $F(3, 628) = 35.01, p < 0.001$ ] 和自我分化 [ $F(3, 571) = 4.59, p = 0.003$ ] 上主效应显著。通过事后比较发现，在青少年自尊、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领悟家庭支持得分上，双高型、互惠主导型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权威主导型和双低型，而互惠主导型和双高型青少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权威主导型和双低型青少年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在自我分化得分中，互惠主导型显著高于其他三类。

表3 不同家庭孝道传统类型在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上的差异比较

变量	双高型		互惠主导型		权威主导型		双低型	
	<i>M</i> ± <i>SD</i>	<i>n</i>	<i>M</i> ± <i>SD</i>	<i>n</i>	<i>M</i> ± <i>SD</i>	<i>n</i>	<i>M</i> ± <i>SD</i>	<i>n</i>
自尊	2.99 ± 0.65	92	2.96 ± 0.56	300	2.55 ± 0.43	79	2.69 ± 0.58	144
生活满意度	5.74 ± 1.02	94	5.57 ± 0.86	301	4.90 ± 1.00	81	4.85 ± 1.01	143
积极情感	3.06 ± 0.63	94	3.01 ± 0.61	300	2.65 ± 0.57	78	2.69 ± 0.61	144
领悟家庭支持	5.54 ± 1.11	95	5.43 ± 1.04	308	4.56 ± 1.12	83	4.55 ± 1.07	146
自我分化	3.60 ± 0.75	85	3.77 ± 0.73	286	3.49 ± 0.58	71	3.60 ± 0.61	133

方差分析表明，来自4种家庭孝道传统类型的青少年在各项结果变量的得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结果进一步发现，双高型和互惠主导型之间、权威主导型和双低型之间均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进一步使用Mplus. 8.3执行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类别预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sup>[72-73]</sup>，预测变量为家庭孝道传统的4种类别（双高型、互惠主导型、权威主导型和双低型），中介变量（领悟家

庭支持和自我分化）和结果变量（积极情绪适应）均为连续变量。

因为双高型积极情绪适应结果最好，且领悟家庭支持水平最高，因此将双高型设为参照组（编码为0），将互惠主导型、权威主导型和双低型进行虚拟编码（编码为1），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后，互惠主导型、权威主导型和双低型对积极情绪适应的直接效应负向显著， $ps < 0.05$ ；权威主导型



和双低型能显著预测领悟家庭支持,  $\beta_2 = -0.355$ ,  $p < 0.001$ ,  $\beta_3 = -0.279$ ,  $p < 0.001$ ; 互惠主导型和双低型显著预测自我分化,  $\beta_1 = 0.162$ ,  $p < 0.01$ ,  $\beta_2 = 0.161$ ,  $p < 0.01$ ; 同时, 领悟家庭支持

和自我分化也能显著预测积极情绪适应,  $\beta_1 = 0.454$ ,  $p < 0.001$ ,  $\beta_2 = 0.419$ ,  $p < 0.001$ 。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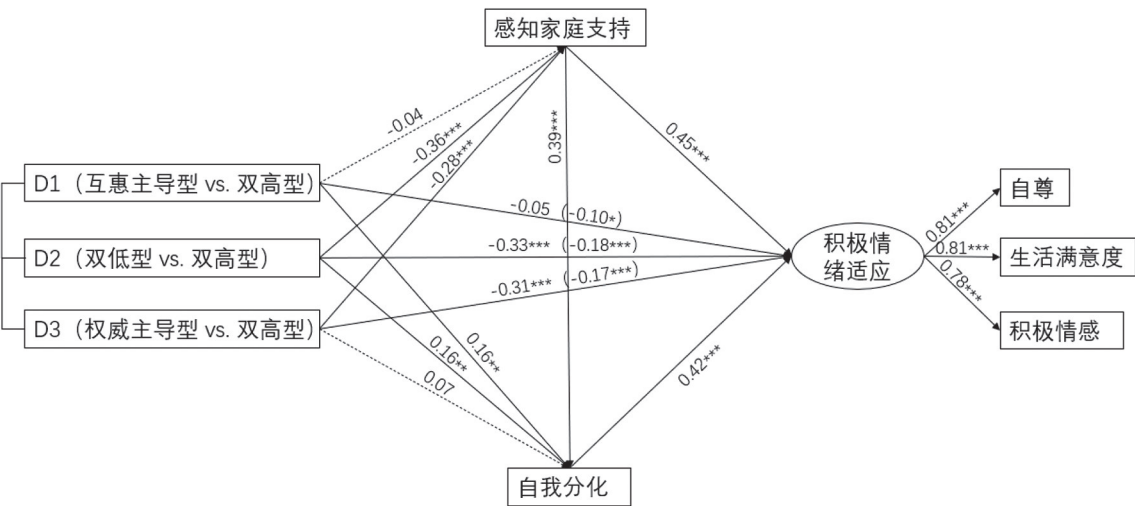


图 2 家庭孝道传统的多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注：图中路径效应值均为标准化数值；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括号中为家庭孝道传统类型对积极情绪适应的直接效应；为了图片的简洁，控制变量性别在图中省略。

中介分析表明（见表 4）：在控制性别、年级后，相较于双高型，其它 3 种类型对积极适应结果均具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另外，互惠主导型（权威性孝道的减少）通过增强自我分化间接影响

积极情绪适应，权威主导型（互惠性孝道的减少）则通过削弱领悟家庭支持间接影响积极情绪适应，而双低型既通过提高自我分化水平又通过降低领悟家庭支持对积极情绪适应产生抵消效应。

表 4 家庭孝道传统类型的相对中介效应分析

比较组	路径 1 (X - M1 - Y)			路径 2 (X - M2 - Y)			路径 3 (X - M1 - M2 - Y)		
	效应值	SE	95% CI	效应值	SE	95% CI	效应值	SE	95% CI
D1	-0.02	0.02	[-0.06, 0.03]	0.06	0.02	[0.02, 0.11]	-0.01	0.01	[-0.02, 0.01]
D2	-0.18	0.03	[-0.25, -0.12]	0.08	0.03	[0.02, 0.13]	-0.07	0.01	[-0.10, -0.04]
D3	-0.18	0.03	[-0.25, -0.12]	0.04	0.03	[-0.02, 0.10]	-0.07	0.02	[-0.10, -0.04]

注：X：家庭孝道传统类型；M1：领悟家庭支持；M2：自我分化；Y：积极情绪适应。

五、讨论

本研究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两种分析思路，探讨了家庭孝道传统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的家庭孝道传统类型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机制。两种思路结果相互补充有助于更全面了解家庭孝道传统对农村青少年积

极情绪适应的影响。

（一）农村青少年家庭孝道传统类型现状

总体来说，农村青少年的家庭孝道传统属于互惠主导型的约占一半数量，而权威主导型的家庭则最少，占比约 13%。这与金灿灿等人<sup>[21]</sup>的研究略有不同。该研究以省会城市（哈尔滨、北京、广州、昆明、西安和武汉）中学生为样本，结果发现持权威主导型孝道信念的男生占比最高，而女生



的互惠主导型孝道信念占比最高。在本研究结果中,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农村中学生群体互惠主导型孝道占比最高。这种不一致可能反映了时代变迁的效应。Bedford 和 Yeh<sup>[74]</sup>强调权威性孝道发展的关键是人们对“子女”这个角色的认同感,它是一个容易随着社会价值观、时代变化的变迁孝道观念。现代社会对子女角色的认知逐渐不再符合传统的亲子等级观念,互惠性孝道对个体发展的正面作用越来越重要,互惠主导型孝道传统逐渐成为主流之一。

## (二) 家庭孝道传统和积极情绪适应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可见,互惠性孝道和自尊、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都显著正相关,在结构方程模型和类别变量的中介模型中也证明互惠性家庭孝道传统能够正向预测积极情绪适应,说明亲子互动亲密的家庭氛围能够提升青少年的积极情绪适应能力。这与前人相关研究相一致<sup>[20,31,75]</sup>。

权威性孝道虽然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都是低相关,与自尊不相关,且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总效应不显著,但在结构方程模型和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中都可以发现权威性孝道可以直接正向影响青少年的积极情绪适应。可能的原因,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互惠性孝道的重要性受到广泛认同,其内涵不断拓展,使得权威性孝道的运作空间受到限制<sup>[76]</sup>。如原本可能属于权威性孝道的规范(如侍奉在双亲左右),现在被视为子女对父母的亲密情感。因此,原本可能属于权威性孝道的积极作用被划分到了互惠性孝道中,但属于权威性孝道所独有的规范作用则继续保留下来。根据规范社会化理论(normative socialization),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会逐渐学会根据社会规范的要求来行动<sup>[77]</sup>。所以,在控制了互惠性孝道以后,权威性孝道反映的家庭秩序会补充有关家庭规范和角色认同的部分<sup>[74]</sup>,使得青少年更好地适应社会化的过程。因此,这一结果也为权威性孝道对个体心理发展的潜在正面影响提供了证据。

## (三) 家庭孝道传统对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机制

首先,在变量中心的模型分析中发现领悟家庭支持在互惠性孝道和积极情绪适应中存在中介效应,在权威主导型与双高型的相对中介效应中发现互惠性孝道维度的下降会显著降低青少年领悟家庭支持,都说明农村青少年家庭孝道传统中的互惠性

孝道越高,会感知到越高的家庭支持进而拥有更好的积极情绪适应,这与以往研究观点相一致。尽管压力缓冲模型<sup>[78]</sup>表明领悟家庭支持可以用来缓解压力等事件造成的消极影响<sup>[79]</sup>,但也有研究表明当个体经历积极事件以后,如能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和反应,同样也能表现出更好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sup>[80]</sup>。

其次,自我分化在权威性孝道和积极情绪适应中存在中介作用,互惠主导型和双高型的相对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权威性孝道维度的降低提高了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这都证明了权威性孝道会负向预测自我分化,结果符合前人研究中孝道对自我的影响<sup>[35,81]</sup>。根据 Bowen 的家庭系统理论,自我分化主要是指在人际和内心层面与重要他人的分离而获得自己的独立和自主性。因此,权威性孝道对个体自主性的负面影响<sup>[81-82]</sup>也会影响农村青少年自我分化水平的形成,从而影响了个体积极情绪适应。

需要注意的是,权威性孝道对积极情绪适应的总效应不显著,但是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后,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遮掩效应(suppression effect)<sup>[70]</sup>。权威性孝道正向预测积极情绪适应,却通过减弱自我分化水平,对积极情绪适应出现消极的间接效应。前人研究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如 Jen 等人<sup>[83]</sup>发现权威性孝道可以直接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但在加入认知灵活性这一中介变量后,对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变为负向预测。这在统计学上称为“符号翻转”(sign-flipping),也被称为混乱中介<sup>[70,84]</sup>或竞争中介<sup>[71]</sup>。这表明该模型可能忽略了与直接路径方向匹配的其他潜在中介。也就是说,权威性孝道通过较低自我分化对积极情绪适应有间接的负向影响,或许可以通过其他间接机制同时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

另外,在变量中心的分析中发现,互惠性孝道未能直接显著预测自我分化,但结合孝道类型的分析却可以发现,互惠主导型家庭孝道类型的自我分化水平显著高于其他3组,原因可能是领悟家庭支持的完全中介作用。家庭孝道传统中互惠性孝道水平更高会使得个体感知到更多的家庭支持,从而提高了青少年自我分化水平。这个发现为家庭孝道传统、领悟家庭支持与自我分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研究的证据支持,同时也为自我分化与文化因素的相关<sup>[47]</sup>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传统的中国人是他人取向,倾向于顺从和顾及他人,人我界限

不明朗<sup>[85]</sup>，集体主义社会中的子女相较于个人主义社会的子女，被鼓励遵守父母的价值体系，保持人际之间的联系<sup>[86]</sup>。本研究不同维度的家庭孝道传统对自我分化不同的影响有利于以后探究其中原因。

最后，研究发现互惠性孝道可以通过领悟家庭支持和自我分化的链式中介去间接影响农村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补充了二元孝道模型中孝行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实证证据。根据 Bronfenbrenner 的生态学理论和社会支持的一般收益模型（General Benefits Model of Social Support），家庭作为个体的内部系统是青少年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感知到较多家庭支持会使得青少年有更好的学业成绩、自尊、幸福感等积极结果<sup>[87-88]</sup>，并可以促进其积极的心理状态，如自我价值、目标等<sup>[78-89]</sup>。这可能是因为互惠性孝道水平高的家庭中亲子互动方式更为平等、亲密，类似于权威型教养方式的作用<sup>[32]</sup>。父母教养方式已经被大量研究证明与青少年适应<sup>[90]</sup>、自我概念<sup>[91]</sup>和社会支持<sup>[92]</sup>等变量相关。同时，在前人研究中自我分化经常被用来描述家庭模式影响个体功能和发展轨迹的方式<sup>[54,93-94]</sup>，这在理论上符合从家庭环境角度研究家庭孝道传统对青少年个体适应的影响。因此，互惠性家庭孝道传统水平更高的农村青少年往往会感知到更多的家庭支持，从而提升其自我分化水平。这对他们的积极情绪适应能力是有利的。

#### （四）链式中介模型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男生感知到家庭中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得分都高于女生，且互惠性孝道差异显著，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对子女性别的规范。中国家庭中，父母通常会对不同性别的子女有不同要求和教养方式，男性子女需要担负起传宗接代和照顾父母的责任<sup>[95]</sup>。而研究结果却发现，整个家庭互惠性/权威性孝道氛围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作用模型并不存在性别差异。这说明性别可能会影响青少年对于家庭孝道传统氛围的感知能力，但是对于个体自身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并不存在差异。李启明等人<sup>[10]</sup>的研究也发现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分别在父亲、母子与子女之间具有相似传递模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性别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谨慎推论，进一步探讨。

## 六、研究启示与不足

### （一）研究启示

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发现拓展了二元孝道模型的研究领域，从孝行环境的角度解释了两种家庭孝道传统对于农村青少年个体发展的不同影响，细致地揭示了两种不同家庭孝道传统对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机制，为领悟家庭支持相关的理论（如一般收益模型）和自我分化理论提供了证据支持。在实践方面，本研究发现可以为农村青少年积极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相对于城镇青少年，农村青少年学生往往面临更多的压力和问题，而家庭孝道传统会影响他们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和自我分化水平，从而影响他们能否发展出积极的情绪适应功能。这就体现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弘扬优秀的家庭传统文化，建设和谐、互惠的家庭伦理环境的重要性。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虽然本研究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第一，数据为横断数据，不能为变量间的关系作因果判断，后续需要采用纵向或实验研究来进一步考察。第二，数据仅从青少年自我报告的方式获得，而研究家庭层面的孝道氛围还需要考虑收集父母、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共同数据才能获得更加准确的测量。第三，样本针对农村青少年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未来应该考虑城乡家庭之间的差异性。第四，孝道作为我国几千年传承的家庭伦理规范，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检验性别、城乡、文化等变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第五，结果出现掩蔽效应和“符号翻转”现象，说明还有更重要的中介机制有待考察，未来可以考虑从家庭三角关系的角度探讨权威性孝道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机制。这是因为，权威性孝道与社会自我知觉显著正相关<sup>[96]</sup>，而关系自主性强调的互依性自我认同（interdependent self - identity）也被认为与权威性孝道呈现正相关<sup>[81]</sup>。

## 七、结论

第一，农村青少年家庭孝道传统中的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均对其积极情绪适应存在直接效应。

第二，农村青少年家庭孝道传统中的互惠性孝道可以通过领悟家庭支持正向影响其积极情绪

适应,而权威性孝道则通过自我分化负向影响其积极情绪适应。青少年领悟家庭支持和自我分化在互惠性孝道和积极情绪适应中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第三,农村青少年家庭孝道传统可以划分为4类,互惠主导型占比最多,权威主导型占比最少。互惠性孝道氛围的提高可以提高青少年的领悟家庭支持,权威性孝道氛围的提高可以降低青少年的自我分化水平。

#### [参考文献]

- [1] 张坤,张文新. 青少年对传统孝道的态度研究 [J]. 心理科学, 2004 (6): 1317-1321.
- [2] HO D Y F. Filial piety, authoritarian moralism and cognitive conservat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J].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994, 120 (3): 347-365.
- [3] SLOTE W H. Oedipal ties and the issue of separation - individuation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 societie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1992, 20 (3): 435-453.
- [4] 孟宪范. 家庭: 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3 (3): 133-145.
- [5] 王向清, 杨真真. 我国农村地区孝道状况分析及其振兴对策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54 (2): 84-92.
- [6] 陈柏峰. 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1): 106-113.
- [7] 韩文根. 中国传统孝文化在青少年德育中的作用——由青少年孝道缺失引发的思考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1 (6): 100-104.
- [8] 王涤. 关于中国现代新孝道文化特点及其功能作用的探析——兼论提倡新孝道文化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J]. 人口研究, 2004 (3): 76-81.
- [9] 袁佳黎, 刘飞, 张文宏. 孝道观念、代际支持与青年群体赡养行为的变迁: 2006—2017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1): 93-103.
- [10] 李启明. 二元孝道代际传递: 亲子性别和子女年龄的调节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1, 37 (6): 808-817.
- [11] 余益兵. 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的评估及其家庭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 [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09.
- [12] 勒纳. 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 第三版 [M]. 张文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03.
- [13] 叶光辉, 杨国枢. 中国人的孝道: 心理学的分析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32.
- [1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3.
- [15] 叶光辉. 再论华人孝道二元模型的几个关键性议题 [J].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9, 12 (32): 207-248.
- [16] 丁志宏, 王伟成. 城市青年孝道观念变化及其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2, 41 (5): 87-95.
- [17] 伊庆春. 回应“华人孝道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J].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9, 12 (32): 187-197.
- [18] VOLLEBERGH W A M, IEDEMA J, RAAIJMAKERS Q A W.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orientations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1, 63 (4): 1185-1198.
- [19] ERIKSON E H. Eight ages of m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66, 2 (3): 281-300.
- [20] LEUNG A N, WONG S S, WONG I W, et al. Filial piety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Hong Kong Chinese early adolescents [J].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010, 30 (5): 651-667.
- [21] 金灿灿, 邹泓, 余益兵. 中学生孝道信念的特点及其与亲子依恋和人际适应的关系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 (6): 619-624.
- [22] CHEN W W. The relations between filial piety, goal orientation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Hong Kong [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6, 36 (5): 898-915.
- [23] YEH K H, TSAO W C, CHEN W W. Parent - child conflict and psychological maladjustment: A meditational analysis with reciprocal filial belief and perceived threa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0, 45 (2): 131-139.
- [24] SEKAR J, LAWRENCE A S. Emotional, Social, Educational Adjustment of Highe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Relation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J]. Journal o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6, 10 (1): 29-35.
- [25]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21.
- [26] 范兴华, 范志宇. 亲子关系与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感: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jkb/>



- 心理资本的中介与零花钱的调节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3): 624–627.
- [27] YEH K H, BEDFORD O.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6 (3): 215–228.
- [28] WONG S M, LEUNG A N, MCBRIDE – CHANG C. Adolescent filial piety as a moderator between perceived maternal control and mother – adolesc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Hong Kong [J]. *Social Development*, 2010, 19 (1): 187–201.
- [29] BEDFORD O, YEH K H.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psychology of filial piety: Chinese norms to contextualized personality construct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10 (1): 1–11.
- [30] AINSWORTH M S, BOWLBY J. An ethological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46 (4): 333–341.
- [31] 姚金娟, 韦雪艳. 基于二元孝道模型的中学生心理社会适应研究 [J]. *教育评论*, 2016 (1): 93–96.
- [32] CHEN W 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filial pie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Hong Kong [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4, 28 (3): 308–314.
- [33] YAN J, CHEN W W.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lial piety, self – 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emerging adults in Taiwan [M] // DEMIR M, SEUMER N.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happiness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Springer, 2018: 151.
- [34] HWANG K K.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Two types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Confucianism [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 (1): 163–183.
- [35] SUN P, FAN X, SUN Y, et al. Relations between dual filial pie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individuating autonomy and relating autonomy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10): 1–9.
- [36] BENSON P L. Adolescent development in social and community context: A program of research [J].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2002, 95 (6): 123–148.
- [37] WEINSTEIN S M, MERMELSTEIN R J, HEDEKER D, et al. The time – varying influences of peer and family support on adolescent daily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J].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2006, 35 (3): 420–430.
- [38] ZIMET G D, DAHLEM N W, ZIMET S G, et al.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8, 52 (1): 30–41.
- [39] TAYLOR S E, SHERMAN D K, KIM H S, et al. Culture and social support: Who seeks it and wh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 87 (3): 354–362.
- [40] BRISSETTE I, SCHEIER M F, CARVER C S. The role of optimism in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during a life transi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 (1): 102–111.
- [41] YEH K H, BEDFORD O. Filial belief and parent – child conflic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4, 39 (2): 132–144.
- [42] SHARAF A Y, THOMPSON E A, WALSH E. Protective effects of self – esteem and family support on suicide risk behaviors among at – risk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 2009, 22 (3): 160–168.
- [43] ZABORSKIS A, KAVALIAUSKIEN A, DIMITROVA E, et al. Pathways of adolescent life satisfaction association with family support, structure and affluence: a cross – 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J]. *Medicina*, 2022, 58 (7): 970–989.
- [44] BRANNAN D, BISWAS – DIENER R, MOHR C D, et al. Friends and family: A cross – 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3, 8 (1): 65–75.
- [45] BOWEN M.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J]. *Famil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1976, 4 (1): 42–90.
- [46] 孙配贞, 杨子硕, 潘梦杰, 等. 二元孝道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30 (3): 588–594.
- [47] CHUNG H, GALE J.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elf – differentiation: A cross – cultural examination [J].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2009, 31 (1): 19–33.
- [48] CHUNG H, GALE J. Comparing self – differenti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 – being between Kore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students [J].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 apy, 2006, 28 (4): 367-381.
- [49] 刘春艳, 王鑫强, 刘衍玲. 大学生自我分化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0, 31 (10): 1256-1257.
- [50] HOSSEINIZADEH M.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components and social adjustment [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13 (7): 84-90.
- [51] HUMAN - VOGEL S, RABE P. Measuring self - differentiation and academic commitment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education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5, 45 (1): 60-70.
- [52] KRYCAK R C, MURDOCK N L, MARSZALEK J M.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stress, and emotional support as predictor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2012, 34 (4): 495-515.
- [53] NIKBAKHT A, AHMADI B M, DASHTINEJAD S B. Comparison of self - differentiation amount between two groups of anxious and Non - Anxious People in Bandar Abbas [J]. Journal of Life Science and Biomedicine, 2012, 2 (4): 142-146.
- [54] BOWEN M.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M].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93: 503.
- [55] JANKOWSKI P J, HOOPER L M, SANDAGE S J, et al.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symptoms: Mediator effects of perceived unfair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J].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13, 35 (1): 43-65.
- [56] 王艳艳, 安芹, 方清. 大学生家庭功能、心理弹性与自我分化的关系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4, 12 (3): 362-365.
- [57] HOWARD M C, HOFFMAN M E. Variable - centered, person - centered, and person - specific approaches: Where theory meets the method [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18, 21 (4): 846-876.
- [58] 彭顺, 牛更枫, 汪夏, 等. 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与调节作用模型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1, 37 (2): 240-248.
- [59] CHEUNG C S S, POMERANTZ E M.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academic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J]. Child development, 2011, 82 (3): 932-950.
- [60] 陈文锋, 张建新.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的结构和效度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 (11): 763-765.
- [61]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 - 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 (2): 276-302.
- [62]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318-320.
- [63] 吴艳, 温忠麟.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 (12): 1859-1867.
- [64] 吴煜辉, 王桂平. 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的初步修订 [J]. 心理研究, 2010, 3 (4): 40-45.
- [65]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6): 942-950.
- [66] 汤丹丹, 温忠麟.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问题与建议 [J]. 心理科学, 2020, 43 (1): 215-223.
- [67] CHEUNG G W, RENSVDOLD R B. Evaluating goodness - of - fit indexes for testing measurement invariance [J].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002, 9 (2): 233-255.
- [68] BECKER T E.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statistical control of variable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 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recommendations [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5, 8 (3): 274-289.
- [69]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 (5): 731-745.
- [70] MACKINNON D P, KRULL J L, LOCKWOOD C M. Equivalence of the mediation, confounding and suppression effect [J]. Prevention science, 2000 (1): 173-181.
- [71] ZHAO X, LYNCH JR JG, CHEN Q. Reconsidering Baron and Kenny: Myths and truths about mediation analysis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0, 37 (2): 197-206.
- [72] 方杰, 温忠麟, 张敏强. 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J]. 心理科学, 2017, 40 (2): 471-477.
- [73] HAYES A F, PREACHER K J.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with a multi - 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 [J]. 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psychology, 2014, 67 (3): 451-470.
- [74] BEDFORD O, YEH K H.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filial piety in the global context: From skin to

- skeleton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1): 1 - 14.
- [75] 魏华, 段海岑, 丁倩等. 百善孝为先? 大学生二元孝道信念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 (1): 40 - 47.
- [76] 曹惟纯, 叶光辉. 高龄化下的代间关系——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变迁趋势分析 (1994—2011) [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 (2): 116 - 144.
- [77] SIMMONS R G. Presidential address on altruism and sociology [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91, 32 (1): 1 - 22.
- [78] COHEN S, WILLS T A.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5, 98 (2): 310 - 357.
- [79] WANG J, MANN F, LLOYD - EVANS B,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lonelines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outcome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 systematic review [J]. *BMC psychiatry*, 2018, 18 (1): 1 - 16.
- [80] GABLE S L, BEDROV A. Social isol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in good times and bad times [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22, 44 (2): 89 - 93.
- [81] YEH K H. Filial piety an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in the Taiwanese family [M] // POSTON JR D L, YANG W S, FARRIES N. *Th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Springer, 2014: 35.
- [82] YEH K H, YANG Y J.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individualizing and relating autonomy orientations in culturally Chinese adolescents [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 (2): 148 - 160.
- [83] JEN C H, CHEN W W, WU C W. Flexible mindset in the family: Filial piety,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general mental health [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9, 36 (6): 1715 - 1730.
- [84] DAVIS J A. *The logic of causal order* [M]. London: Sage, 1985: 33.
- [85] 杨国枢.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 社会互动的观点 [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005 (1): 21 - 54.
- [86] TRIANDIS H C.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9, 96 (3): 506 - 520.
- [87] CHU P S, SAUCIER D A, HAFNER E. Meta -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well - be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10, 29 (6): 624 - 645.
- [88] RUEGER S Y, MALECKI C K, PYUN Y, et al. A meta - analytic review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6, 142 (10): 1017 - 1067.
- [89] COHEN 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4, 59 (8): 676 - 684.
- [90] KERR M, STATIN H, ÖZDEMİR M.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revisiting directions of effects and the role of parental knowledge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2, 48 (6): 1540 - 1553.
- [91] LEE S M, DANIELS M H, KISSINGER D B. Parent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adjustment: Parenting styles versus parenting practices [J]. *The Family Journal*, 2006, 14 (3): 253 - 259.
- [92] 刘拓, 陈雪明, 芦旭蓉, 等.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 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1, 19 (4): 507 - 514.
- [93] PELEG O R A. The 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5, 33 (2): 167 - 183.
- [94] SKOWRON E A, HOLMES S E, SABATELLI R M. Deconstructing differentiation: Self regulation, interdependent relating, and well - being in adulthood [J].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2003, 25 (1): 111 - 129.
- [95] BARBALET J. Greater Self, Lesser Self: Dimensions of Self - Interest in Chinese Filial Piety [J].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2014, 44 (2): 186 - 205.
- [96] 姚金娟, 韦雪艳, 耿庆岭, 等. 中学生的社交自我知觉与自尊在二元孝道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6, 30 (8): 593 - 599.

(责任编辑: 容媛媛)



# A Chain Mediation Model on Family Norms of Filial Piety and Positive Emotional Adaptation in Rural Adolescents: Person-centered and Variable—centered Approaches

YU Yi-bing<sup>12</sup>, GONG Chong<sup>1</sup>, YU Jia-wei<sup>1</sup>

- (1.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0, China;
2. Guangxi University and College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Applied Psych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Abstract:** The person-centered and variable—centered approach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norms of filial piety on adolescents’ positive emo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with the survey data including 691 rural adolescents from four provinc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uthoritative filial piety and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dicators of positive emotional adaptation;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affects positive emotional adaptation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authoritative filial pie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the model above has gender equivalence. Taking the double-high type (15.05%) as a reference group, the reciprocity-dominated type (48.59%), the double-low type (23.35%) and the authority-dominated type (13.01%) all negatively predict positive emotional adaptation by reducing level of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or self-differentiation. Conclusion: Both reciprocal and authoritative family filial piety norm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dolescents, and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re different.

**Key words:** family norms of filial piety; positive emotional adaptation;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rural adolescents